

MTO: 公共住房拆迁对儿童的长期影响

过去三十年里美国住房援助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少有文献研究公共住房拆迁对原住居民的长期影响。由来自达特茅斯学院的学者 Eric Chyn 发表在 AER 上的论文“Moved to Opportunity: The Long-Run Effects of PublicHousing Demolition on Children”初次估计了芝加哥公共住房拆迁对儿童的长期影响，提出搬离贫困地区对儿童长期影响的新证据。

I. 芝加哥公共住房拆迁的历史

文章首先介绍芝加哥公共住房拆迁的历史。芝加哥住房管理局 (CHA) 拥有并管理着 17 个公共住房项目，每个项目拥有许多楼房，许多是有 75-150 个单元的高层建筑。公共住房主要提供给低收入家庭。如果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达到或低于芝加哥收入中位数的 50%，他们就有资格居住在公共住房中。但是，由于楼房的维护问题，当局制定了计划，以租房补贴取代项目住房援助，并通过建筑物拆除逐步淘汰公共住房。其中，由于租房补贴和基于项目的援助方案规则是相似的，租房补贴不会影响受助家庭的收入。

II. 拆迁对儿童的预期影响

迁移的家庭使用租房补贴搬到了低贫困的社区。这会使儿童得到收益，可能的影响机制包含：(1) 一种可能是，他们以地贫困社区有能力的成年人作为榜样；与高收入的同龄人接触，提供工作信息；以及迁移使他们的父母拥有更好的就业网络，让他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增加对儿童发展的投资。(2) 另一种可能是，搬迁可能会改变孩子的教育质量。迁移的低贫困的社区通常有更好的教师和更小规模的班级，或者儿童能够进入更好的学校。(3) 即使他们的家庭没有搬到不那么贫困的社区，儿童也会产生收益，是因为公共住房项目的物理设计和密度也会助长犯罪和其他负面行为。

III. 数据资源和样本构建

文章所使用的的数据来源非常丰富。包括建筑记录 (CHA)、社会援助 (如, TANF/AFDC, Food Stamps, 和 Medicaid) 文件 (IDHS)、失业保险工资记录 (1996-2009, IDES)、综合逮捕记录 (截止到 2009 年, ISP)、IDHS 帮扶文件 (1989-2009)、来自芝加哥公立学校 (CPS) 和国家学生交流中心 (NSC) 的记录等。

首先，作者构建了公共住房楼房样本。在 1995-1998 年的第一轮拆迁期间，共包含 7 个项目的 53 个高层，20 个拆迁楼房作为处理组，33 个楼房在 1995-2000 年期间没有拆迁作为对照组。

其次，作者将家庭数据联系到公共住房体系。依赖于社会援助记录中提供的福利接受者的地址数据，将其与公共住房拆迁之前的楼房地址进行匹配，识别出的样本与搬迁对社会帮扶参与的影响无关。在社会援助记录中，总共识别出房屋拆迁之前住在公共住房里的 5676 个成年人的数据。

再次，作者找到了拆迁年份为 7-18 岁的儿童。在这些样本中，作者观察每个儿童成年期 (>18 岁) 结果至少 3 年，至多 14 年。最后样本包含了来自 2767 个家庭的 5250 个儿童，构成了个人-年份层面的面板数据，时间从其楼房拆迁日期到 2009 年 (劳动力市场和福利结果的最后一年)。

最后，作者将包含劳动力市场结果、社会援助收据和刑事逮捕的行政数据与上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合并，得到最终的数据集。

IV. 实证方法

首先, 文章所使用的的实证方法主要比较住在被选择拆除的楼房中的儿童与住在未被拆除楼房的同龄人进行比较。模型如下:

$$Y_{it} = \alpha + \beta D_{b(i)} + \psi_{p(i)} + \epsilon_{it}$$

其中, β 代表由于拆迁导致的搬家对儿童结果的净效用, 同时也衡量了从公共住房援助到住房补贴的住房帮助形式改变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 该设计的有效性取决于拆除建筑物的选择是否与居住在公共房屋的儿童的特征无关。因此作者检验了拆除之前基期儿童特征的测量结果, 发现搬家儿童和没有搬家儿童的特征没有显著差异, 证实了该设计的有效性。

其次, 作者将房屋拆迁作为 IV, 检验了在公共住房中居住年份每增加一年的“剂量”效应, 这是令政策制定者更为感兴趣的内容。2SLS 模型如下:

$$P_i = \gamma + \tau D_{b(i)} + \psi_{p(i)} + \eta_{it}$$

$$Y_{it} = \pi + \theta P_i + \psi_{p(i)} + \epsilon_{it}$$

IV 估计解决了 OLS 估计中造成的偏误, 即公共住房参与的选择性。

最后, 作者提出估计中可能存在摩擦和空间溢出问题。第一, 缺失数据问题。搬迁儿童更有可能搬到别的州。伊利诺斯州的数据显示, 搬离该州的个人即使在新居住地工作, 收入也为零。作者使用 Grogger (2013) 的 terminal runs of zeros 方法检验没有发现相关影响。第二, 拆迁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照组的未搬迁儿童可能会受到邻近拆除建筑物的同龄人的搬迁的影响。增加居住在临近拆迁建筑的对照组建筑的指示变量检验, 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空间溢出问题。

V. 实证结果和分析

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 (1) 拆迁三年后, 与非拆迁家庭相比, 搬迁家庭居住的社区贫困率更低 (21%), 暴力犯罪率更低 (42%)。 (2) 发现搬迁儿童长大后有明显更好的劳动力市场结果。与没有搬迁的同龄人相比, 搬迁儿童成年后就业的可能性要高出 4 个百分点。此外, 搬迁儿童的年收入比非搬迁儿童高出 \$602, 比非搬迁儿童的年收入高出 16%。在拆迁后的几年里, 搬迁儿童因暴力犯罪被捕的人数减少了 14%。此外, 在更小的年龄搬迁的儿童不太可能从高中辍学。(3) 上述检验证据还揭示了拆除公共住房的成本和收益, 这一直是美国住房政策的主要焦点。粗略计算表明, 一个因拆迁而搬离公共住房的孩子一生多赚 4.5 万美元 (按现值计算为 1.2 万美元)。与此相关的税收增加超过了公共住房居民的平均搬迁成本。这表明, 改善弱势儿童的长期结果的努力将为政府预算带来净收益。

此外, 作者将公共房屋拆迁导致的搬迁的积极影响与家庭获得标准第 8 条住房券的 MTO 项目的儿童进行对比, 发现参加 MTO 第 8 条住房券帮助的效应为负值。这是因为: (1) 选取的公共住房街区的贫困率不同; (2) 家庭类型不同, 一个是家庭没有能力决定是否拆迁, 另一个是自愿参与到项目之中; (3) MTO 项目中的原住民可能会在搬迁之后灰陶原来的街区探访亲友, 拆迁项目没有这种可能。

VI. 结论和讨论

本文首次提出居住在贫困街区公共住房的儿童由于拆迁带来的长期因果效应。发现因公共住房拆迁而搬迁儿童在成年早期的劳动市场表现明显优于非搬迁的同龄人。搬家对幼童 (7-12 岁) 有更大的积极影响。这项措施可能为政府预算带来净收益。

讨论。首先, 使用了多来源的丰富数据资源, 样本筛选和匹配的方法非常的精细, 考虑

到了拆迁时间和儿童年龄的呼应，并且匹配出一个过年的跟踪面板数据，信息含量非常大。其次，对可能产生偏误的识别。考虑到与特征相关的选择效应，样本筛选问题中可能存在的偏误，数据的问题以及环境影响偏差的解决。还可以增加的一个机制检验，即对结果的影响可能来源于街区密度而不是搬迁到一个更好的环境，可以通过拆除楼房中选择租房补贴迁移至其他私人市场住房和选择迁移到其他的公共住房项目的样本进行对比，估计出是密度还是环境占据主导因素。最后，通过与其他项目进行对比，说明了拆迁选择的随机性，使通过该设计得到的结果更加具备说服力。